

亦所見的新波蘭

著 朗特 斯 • 美
譯 華 棟 李
行 發 店 書 華 新 北 華

我所見的新波蘭

美
斯特朗著
李
棟華譯

華北新學書局發行

我所見的新的波蘭

著者：

美·斯特朗

譯者：

李·華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出版

卷頭語

這本書，是波蘭人民，在波蘭工人黨（波共）組織領導和蘇聯援助下，戰勝希特勒匪幫和國內反動派，英勇鬥爭的歷史。它非常強烈地告訴我們，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新民主主義的新波蘭一定會強盛繁榮起來。

作者斯特郎女士，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五年七月，遍歷波蘭各地。她幾乎親眼看到了新波蘭的一切。這本書，就記載着她的見聞。

土地改革是新波蘭的基礎，也是貫穿全書的一個主要題材。在當時，波蘭農民們雖然已經分配了，佔波蘭國土五分之一，差不多一百萬英畝的土地；可是，他們並沒有翻透身。我們必須估計到，近二年來，波蘭土地改革運動的新發展。我想恐怕就是因為土改的深入和廣大羣衆的覺醒，使米柯拉茲科那些滓渣可恥地滾出了波蘭。譯文煩梅益同志修正一過，至爲感奮。惟譯者疏漏難免，除向作者致歉外，尙請讀者指教。

譯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目次

序：爲什麼談波蘭	(一)
一 往波蘭去的外交車	(七)
二 盧布林	(二五)
三 盧布林的食侶	(四一)
四 國家的首腦	(五七)
五 新波蘭軍	(七五)
六 華沙前線	(九一)

- 七 波耳暴動 (一〇七)
- 八 土地改革 (一二七)
- 九 拉左縣 (一四三)
- 十 一個政府誕生了 (一五七)
- 十一 華沙——首都 (一六五)
- 十二 他們團結起來 (一八一)

為什麼談波蘭

幕閉了，電燈照耀得雪亮，邱吉爾與斯大林一同站在政府人員席裏，觀眾對歌舞劇的喝采突然轉移到莫斯科歌舞劇院池座後排的中間，高漲成爲雄壯的吼聲。聯合國的外交人員，着軍服的盟國軍人，一齊站起來特向領袖們致敬。蘇維埃政府人員與模範的工廠工人們都爬到樓座的欄杆上瘋狂地歡呼。

這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的一個晚上，在戰爭年月莫斯科從容不迫的空氣中我初次感到緊張，英國首相來此參加製定聯合國戰後世界共同綱領的一個會議，他在大衆面前與斯大林和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相互握手，然後向劇院裏喝采的羣衆鞠躬，和諧——不僅從樂隊來的——彌漫了空間。在痛苦的戰爭的殘跡上，偷偷襲來了一脈和平的氣息。

一天一天過去。談判比預料的更長地拖延下去。原因倒很好猜。我們記者們用不着英國隨員在每日記者招待會裏的暗示，說什麼「首相對波蘭問題花費五分之四的時間」，就會了解到癡結所在的。我們知道倫敦波蘭流亡政府首相米柯拉茲科乘了邱吉爾的自用飛機來了，貝魯特和摩拉夫斯基等波蘭實際工作的領袖們也從盧布林委員會飛來了，四方面的談判正在進行，一般認爲談

判在「進展」中，正說明了沒有什麼成就。當邱吉爾最後在英國大使館書房裏接見記者時候，劈柴火在熏熏地燃燒着，牆上掛着盛氣凌人的英帝國君主的像片，他拿波爾戰爭（十九世紀末兩非人民的反英戰爭）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我們知道除一般波蘭問題外仍然是不能發表的。

波蘭會是一個矛盾的中心，從中世紀以來曾經是戰爭的起因或目標。正因為這樣，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波蘭拒絕了蘇聯援助抵抗希特勒的建議，便阻了英法蘇的軍事談判。當時聯合國會議的崩潰正好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釁端，波蘭就是最先的犧牲品。在五年戰爭中，同一波蘭政府與莫斯科間未解決的分歧影響了同盟國的團結，威脅着未來和平的鞏固。

眼前的問題是三分之一的波蘭解放了，急得英國首相跑到莫斯科來。一九四四年夏天紅軍向西挺進，抵達維斯杜拉河，準備繼續前進，在蘇聯組成的十萬波軍參加了這些勝利，蘇聯政府正式宣佈紅軍不在波蘭組織行政機構，而是在「一個獨立友好同盟國的領土上」與波蘭軍合作的。即使這樣，也並沒有解決了這樣的問題：蘇聯是與什麼波蘭當局發生關係呢？承認什麼波蘭政府呢？

倫敦波蘭流亡政府仍為英美所承認，牠對於蘇聯的仇視在繼續着而且是臭名遠揚的，牠認為紅軍的前進不是解放而是侵略。最後蘇聯政府只好與牠絕交。這樣除非在波蘭的反希特勒力量團結鞏固起來，把紅軍作盟軍看待，波蘭就會在解放的時期沒有政府，而沉淪到內戰的混亂局面。在國內有遠見的波蘭人，看到這種情況，就在一九四三——四四年的除夕在華沙秘密召開了波蘭國民會議。幾十個積極抵抗納粹而且歡迎紅軍作為解放波蘭的同盟軍的地下組織——各政黨與各游擊隊——派代表出席。他們宣佈擁護効法民主法國的一九二一年的波蘭憲法，反對美蘇納粹的軍人集團所馬虎抄就而為倫敦流亡政府當作法治基礎的一九三五年憲法。他們決定組織地下

縣區會議，準備在解放時履行職務，決定組織地下「人民軍」各個游擊隊，好與紅軍配合作戰。一九四四年一月，這個新的組織用無線電向莫斯科倫敦與華盛頓致候，因為電力太弱，雖然沒有播到。所以，在許多地方國民會議與人民軍支隊成立以後，波蘭國民會議就派代表團穿過戰綫往莫斯科去，「與各同盟國政府聯系」。這是一九四四年的五月，駐莫斯科英美大使絲毫沒有理會他們。但斯大林立刻認識到這一新的會議將會幫助紅軍席捲波蘭的攻勢而且能解除蘇聯在友邦的國土上建立軍事政府的煩悶，他與他們協商，而且給人民軍補充武器。

七月紅軍進入波蘭，這個在德國佔領區仍保持秘密的國民會議，就在盧布林成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執行解放區政權任務，蘇聯承認牠為實際的政權，而且把在蘇聯組成且裝備很好的十萬波軍交給會議。倫敦波蘭人於是否認新會議與解放委員會，認爲牠爲莫斯科的傀儡。因爲這羣倫敦波蘭人仍被英美承認爲波蘭政府，世界報紙就爆發了尖刻的討論。情況太嚴重了，於是英首相不得不到莫斯科來，進行長時的會談。

在當時我們並未想到會談會拖長到八個多月，比戰爭本身拖得還長，引起克里米亞會議與舊金山聯合國會議的注意。最後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底，在蘇聯所承認的議會基礎上，加上英美推薦的要員，才組成全國統一的臨時政府，問題才算解決了。

在我看來，波蘭是擺在全歐洲面前許多問題裏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在納粹造成的混亂中怎樣產生新政府？怎樣把人民團結到民主的國家裏？離開祖國五年多的流亡政府還有什麼作用？這些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去澈底粉碎希特勒歐洲？什麼經濟基礎，什麼政治形式？他們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應該怎樣？對蘇關係怎樣？它們不可避免的內部衝突是不是將擴大成爲主要盟國間的摩擦？或者在它們國內適應不同民主理想所做的實驗會幫助聯合國的相互諒解？

當邱吉爾的隨員隨便說出邱吉爾對波蘭怎樣花費工夫的時候，我就開始想去看。既然波蘭人這樣重要，現在就該找出爲什麼。我在莫斯科英美大使館圖書館裏找材料，沒有找到任何一種關於波蘭的書。只有大英百科全書裏的一篇與世界史全書裏面的幾節，都是好多年前著錄的東西。我對著錄的缺乏太吃了一驚。讓我們著一本關於波蘭的書罷，我這樣對自己講。

我遇到來莫斯科開會的波蘭人。他們是兩種類型的。倫敦波蘭人圓滑巧辯，根據一點爭論的事實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我碰到他們大談東部波蘭問題。我在一九二一年參加美國公館服務隊親自在波蘭工作過，曾看到在烏克蘭白俄羅斯農民的悲慘的農村，他們與波蘭大地主的農奴沒有兩樣。但倫敦波蘭人却很滑頭地去狡辯這些事實。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波蘭人是油滑的外交家，除非另一個波蘭人，誰也要不過他的花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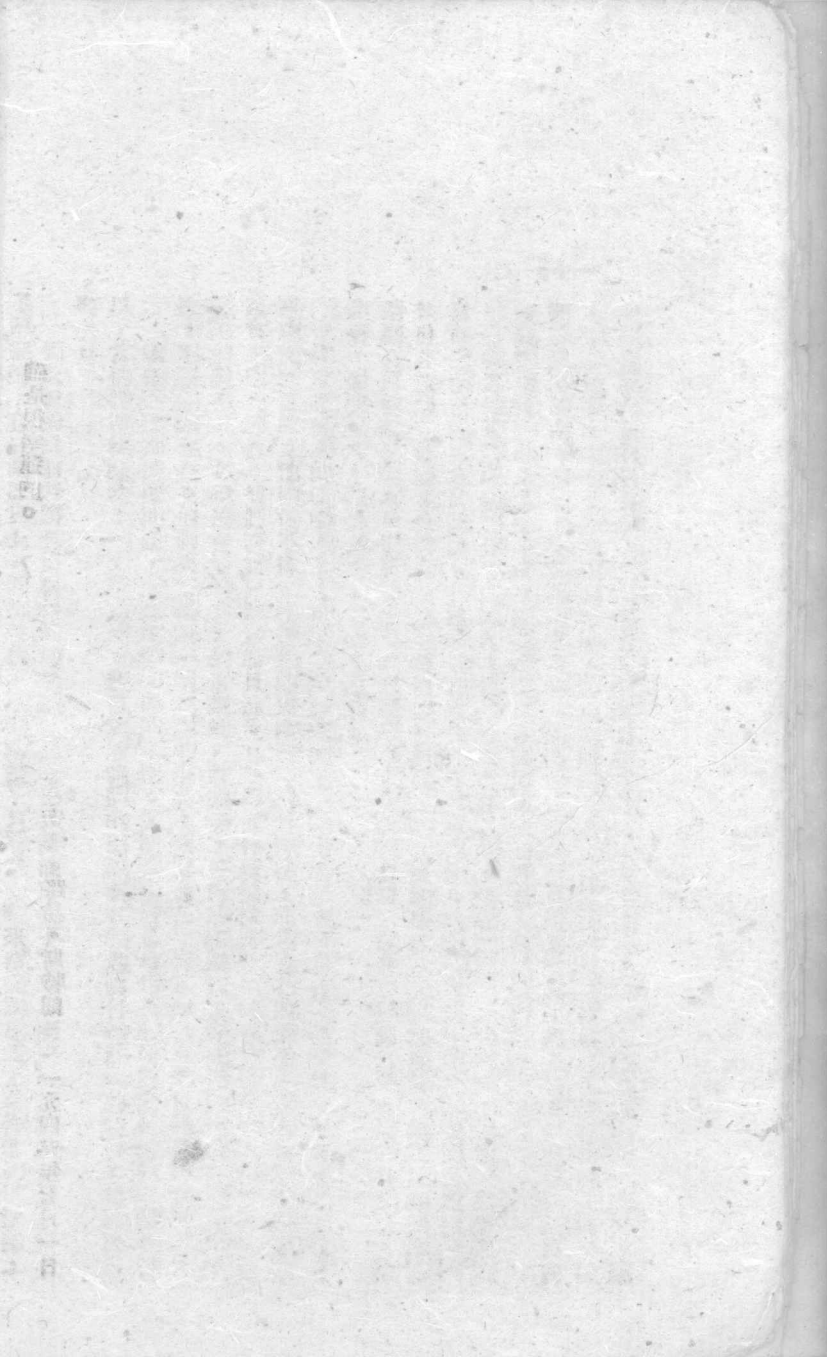
從盧布林來的波蘭人——後來從華沙來的——給我迥然不同的另一種印象，波蘭人原來也是直爽而老實的。他們並不像在半封建的東歐所碰到的那樣，而是像在西美平原或在世界各地辛苦踏實工作的那樣。他們看來很踏實而且進步。他們覺得像波蘭那樣大的國家要想在大國間耍手腕是不能興盛的，必須依存於對其大的東鄰的友好關係，任何妨礙這種友好關係的衝突必須馬上解決，不讓繼續存在。他們決定建設一個民主的波蘭，而且要在今天互相依存的世界裏達到獨立。這些不僅是波蘭問題，而是我們共同的事情。波蘭當時嚴正地用新的姿態對付這些問題。所以，當他們這樣邀我：『來波蘭罷，親自看看我們的困難與我們的應付辦法』的時候，我就決定要去。

對於波蘭目前問題直接材料的迫切需要使我把見聞簡單記了下來，歷史材料的敘述只在幫助了解經歷，在波蘭歷史上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來自美國或西方的作者到了波蘭，

確是很幸運的。

安娜·路易·斯特朗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



一 往波蘭去的外交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請把行李搬到京城飯店前的人行道上，飛機馬上要走，我們汽車路過的時候把你帶去，請注意車頭上插的紅白旗。」

這是莫斯科波蘭大使館在電話上講的。我便帶着有把握的愉快心情，立刻跑到鋪滿霜的人行道上。坐飛機只要四個鐘頭啊，下午就可以到盧布林的。一個和藹的外交信差把我的行李提到立刻寄往盧布林的兩捆重要文件上面。我只驚訝地在想那是些什麼文件，就忘記注意去看沾了泥土而且破裂開了的包皮；如果看的話，總會曉得點的。

在機場等了三個鐘頭。說是明斯克有霧。午間又回到京城飯店。「白天趕不到了，明天再看罷。」信差這樣說，他已經一連往機場去了三個早晨。明斯克的霧是長期的。從莫斯科到波蘭要經過最大的澤地，幾百方英里都是溼的，就在這裏，從波羅的海和大西洋灣流刮來的海風，碰到俄羅斯平原的寒爽。但這長期的霧却是很稀薄，經常到午間就會消散。我們天天到機場等就是因為隨時會有希望，這正如同我們希望波蘭與莫斯科間其他霧氣隨時會消散一樣。

我的第四次嘗試不同了。因為頭天晚上波蘭大使館慶祝獨立的宴會使得大家都晚了。我們到機場時候引擎已開始轉動，飛機離我們二百來尺，正要起飛。飛機的門已經關了，守衛不讓再往

前走，我們只顧着飛時的烟塵。『爲什麼不坐火車呢？』他們在波蘭電訊社問我。我以前拒絕坐火車，因爲在戰爭情況下至少要用三天，但我已經費了四工夫去等飛機。同時我聽到一個外交專車要往盧布林，同行的有波蘭駐莫斯科代表任德魯普斯基博士（Jendrychowski）原註：現任駐法代表。波蘭電訊社長莫德索路斯基上尉（Moderski）原註：現升上校，爲波蘭駐蘇大使。維爾諾與勒沃夫地方來的要參加解放委員會的幾位教授，以及參加波蘭軍的幾位軍官。三天的外交人員待遇，加上和他們的談話，當然很好。

當晚，我到了燈光黯淡的車站——莫斯科離開前綫雖然有三天的火車路程，燈火管制却很嚴格——看到活潑的人羣圍繞在一輛普通「硬座」客車的門口。我驚訝。車是舊式的，當上鋪伸開的時候，下鋪的人就不能坐直，硬的臥鋪上鋪了一層薄墊，這是給外交人員特別準備的。可是，沒有一個人表示不滿；於是，我就鋪開我的寢囊，吹起我的氣墊。

開始，我討厭自己行李多，寢囊，提包裹裝了三天食物，攔在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老式的提箱，一箱紙，打字機，富裕的食品。這些我都搬到寬大的行李架上。總之，比我個人能帶得動的多了一件，還在戰時旅行是不合適的。當另外兩個婦人帶着我二倍的行李進來的時候，我的心才放下來。

這兩位婦人開始安置座位，一個是金髮碧眼的波蘭文盲的老婆，在蘇聯逃難五年，現在回盧布林去，另一個是中年的教師，原來在華沙教書，在西伯利亞住了五年，現在回去。車快開時，來了一位黑髮的猶太女子，兩個腳伏給她搬着八件行李，顯然是大批笨重書籍。

其他兩位婦人很敏感地向後退縮。是對擁擠情況的正常抵抗呢，還是對後來者的種族的反應

呢？可是過了一會他們的態度就轉變爲很融洽的樣子，好像他們有意識地在說：「波蘭現在是要民主的，猶太人現在是平等的公民，在蘇五年並不是白過了的。」

最後的四個提箱擱在她的臥鋪的一頭——在我的上面。一道兒，她在上面既不能伸腿，我在下面也不能完全坐直，因爲她的臥鋪是永不能推起的。

沿着部分修理了的鐵道，向西南慢慢前進，不是三天，已經四天了。我估計經過明斯基的幹綫可能被破壞了，更可能是專供軍用，所以我們才繞道基輔。在這綿延千把英里的土地上，盡是被蹂躪的田野，燒毀的村落，狹窄的城鎮的殘骸，毀壞的橋梁，塌倒的車站。在西歐找不到類似的地方，更能說明德寇是怎樣執行所謂戰爭規律的。在所有斯拉夫的土地上，德寇實行着毀滅民族的政策，搶光牲畜，趕光居民，燒光一切。

我蜷伏在臥鋪靠窗邊的一角，聽婦人們談論戰爭給家庭生活帶來的惡果。我進入了一個內部的世界，與火車經過的外部慘象同樣的猙獰可怕。

「我妹妹六歲的孩子堅決要參軍」波蘭文官的老婆說：「他親眼見到他的父親在他家門口被德寇殺死。他一直要求部隊帶他。他對母親說：『母親，我一定要走。』」

教師認識的一個男子，爲了不叫敵人抓住他的老婆，把她殺死。『他們正在奧勒爾附近野地裏逃跑，德國人就要抓住他們，女人跟不上，男人盡力幫助也不中用，所以用槍把她打死，自己跑到森林裏參加了游擊隊。二年後，他向我講這件事，』「我只得那樣了。」

猶太女子開始不講話，第二天早晨我才聽到她的事情。她是一個醫生，德國開始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在數得薩參加醫學會議。她向東逃到中亞細亞。她的丈夫，母親，兄弟姊妹，孩子同在勒伏夫附近的小鎮被德寇屠殺了。

「在英美，人們很難相信這些事實，」她是直接對我講的，「這也難怪，當我在沙瑪迦（Samarkand）附近集體農場工作的時候，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甚至連對於暴行的官方報導也不信，後來紅軍解放了我的家鄉，我得到直接信息，我只感到一件事情倒還痛快，就是他們立即在家門口被殺害了——德寇是一來就殺的。這倒免得他們被拉到麥丹尼克（Maidanek）的死亡集中營長時活受罪去。」

到了基輔，車停在側道上，與盧布林聯絡。我進城看到克利斯加（Kreschak）街的廢墟，這原是世界著名的美麗環形街道。德寇有計劃地把它炸毀，在退却時還放了火。這裏一隊一隊的德國俘虜在收拾殘跡，來往的烏克蘭人絕少睬他們的。

我到旅客飯店找史諾（Edsnow）。他在我前一天離開莫斯科，專來基輔，當時沒有想到我赴波蘭途中會繞道這裏的。史諾不在家，作為訪問他的朋友，便有權利在飯店吃飯，我與同來的波蘭軍官要了蛋糕和茶——這是我們兩天內第一頓熱飯。

維耳克上尉（Welker），漂亮，精幹，肩章上三個星星，還帶着先在法國後到非洲集中營多年苦難的一些遺痕。他很早就對納粹作戰，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人民政府失敗了，跑到法國，恰恰被囚禁起來。後來德寇佔了巴黎，把他遣往非洲沙漠去撿磚扛石頭，每日配給五薄片麵包和兩盤稀菜湯。

「差不多兩萬波蘭人爲民主西班牙作戰，」他對我說，「現在還活着的却寥寥無幾了，一九三九年到法國的時候是一千五百人，到非洲時候只剩下二百人，集中營的看守長是法國的法西斯份子，親自用手杖打人的，他恨我們在西班牙作戰。」

當美國人在非洲登陸時候，集中營裏的波蘭人被認爲是「杜布盧斯基旅（Dombrowski Btlz

的殘餘」，現在是願為波蘭作戰的。倫敦波蘭流亡政府派代表對他們說，因為他們為西班牙人民政府作戰，就丟掉了波蘭國民資格；因此，他要一個一個地考查。

他問：「你們願意打斯大林嗎？」

「但是他我們的同盟者喇！」他們反駁。

「你們不必過問政治，讓你們打誰就打誰好了。」結果，他認為他們不可靠，只要了幾個，其餘的都送到英國勞動營。

最後，一個蘇聯領事到了非洲，傳說在蘇聯要組織波蘭軍。「我們立即表示自願，有的經過一年的怠工爭取才被勞動營裏釋放。最後總算讓走了。在蘇聯，他們訓練我作飛行員，我會經在波蘭空軍中作過兩個月的戰，這是我第三次要為波蘭戰鬥，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從法國，一次從非洲，現在是從蘇聯。只有蘇聯人才肯讓我這樣作的。一開始作戰，當過國際義勇隊旅長的黑貝納少校（Major Ribner）就得到蘇維埃英雄的勳章。

我們回到火車上的時候，他繼續說：「自從哥塞斯哥（Kociusko）為美國革命戰鬥以來，一百五十年間，波蘭人有的是為他國的自由而戰鬥的，現在我們將有為波蘭而戰鬥，並且使她獲得真正自由的機會了。」

過了基輔，我們的客車便接在貨車上，夾在兩輛滿裝着雜草的車皮中間。在曠野裏停的很久，地上的雪一會兒便化成污泥。車裏冷起來了，燈和暖氣都不起作用。「等着騎馬罷！」盧布林存的草還够兩天用呢，大家這樣說笑。我們都帶着食品，問題是要有開水泡茶；可是，以往供給開水的車站都被毀壞了，結果，經過管理員一再努力，只得到每日喝一次茶。

同伴們的熱情補償了物質的煩悶。他們都是從地球上各地流亡回來的，來來往往互相交結，